

第一章 绪论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收集了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经济学研究的著作、手稿和通信。它们是马克思在一生中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辛勤成果，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一生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所作出的一切辉煌成就和以完整的科学形态表现出来的他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继承这份珍贵的科学遗产，从中汲取丰富而有益的思想营养，使它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无疑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职责和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在对《资本论》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在这种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着不少薄弱环节。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体现于《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缺乏深入细致和系统的分析，并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予以综合的研究。因此常常出现两种偏向：或者仅仅把《资本论》看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经济学的证明，忽视了对包含于《资本论》本身中的并带有其独特特点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研究；或者用完整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图解《资本论》，在其中寻找各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事例来论证个别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两种偏向的共同弱点在于他们都没有把体现于《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看作是一种带有自己独特特点的理论体系，看作是

哲学和经济学思想的交融发展而形成的“经济学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披上了经济学外衣的哲学。因此这种“两张皮式”的看法，不仅在理论上极大地妨碍了关于《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深入研究，而且在实践中也为《资本论》的光辉思想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形中设置了重重障碍。我的研究将证明：《资本论》在其创作过程中是哲学和经济学理论的交融发展。在其完整的形态上，《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带有其独特特点的经济学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不仅在当时正确而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而且就是在今天，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理论研究也有着极大的方法论意义。

自从 1846 年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并随之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之后，《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就成为广大科学工作者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可能正是由于《资本论》的产生使历史唯物主义由一种假说变成了为科学的理论实验所证实的真理之故，从而使历史唯物论不仅在其骨骼形态上，而且在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的形态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资本论》有其严密的逻辑和辩证法思想，但更有作为理论底色的灵魂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正如马克思自己所指出的：“在象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①那迷人的震撼人心的理论大厦的精巧结构，吸引了无数的科学工作者的目光，但对于那渗透于大厦的一砖一石之中的灵魂则相对地予以忽视。从《资本论》产生至今一百多年来，国内外虽不乏辛勤的理论耕耘者，来探寻这座

宏伟建筑的理论基础和精神，但往往不是失之简单化，就是落于纯粹经济理论细节的讨论之中。不知是时代的召唤还是由于什么别的原因，我有一股强烈的愿望，愿意涉猎这一虽有无数前人研究过，但却未能尽如人意的研究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理论和方法永远是一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正是在这把解剖刀的作用下，被一一分析、综合起来，构成了在思想上再现出来的理论整体。这种由马克思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马克思研究工作的理论，^①在整个《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起了任何其它理论和方法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我们面临着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事业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它需要我们用理论来加以分析，这对于历史唯物论来说，则是非君莫属！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寻找出马克思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寻找出在《资本论》这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作为理论底色和精髓存在的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整体，来作为我们今天对于面临的新情况和新任务以及新的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环境进行研究的理论工具，明确我们在前进中所应汲取的经验教训和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向。这种研究，诚如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对他自己所讲过的那样，不可能没有细节上的缺点，但整个探索无疑是有着重大时代意义和价值的。

我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在把历史唯物论运用于分析和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过程，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走过了他在创立新的历史理论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2—33 页。

中所走过的相同道路。历史唯物论在它的经济学化的过程中，即把它具体运用于一门具体科学，达到从一般到个别转化的时候，它所经历的曲折和艰难决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其理论本身的创立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推动理论研究不断前进的是多种矛盾和因素的相互作用，但最主要的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作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并掌握了崭新理论武器的马克思来说，详细阐明工人受剥削和压迫的原因，探讨如何摆脱这种受奴役地位的途径和道路，始终是他的头等任务和最重要的工作。因此，表现在他的理论研究之中，就实际经历了两个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过程，即以说明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为突破口，首先寻找到了隐藏在这种特殊商品背后并决定着一切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劳动二重性的理论，从而实现了把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理论经济学化的过程；然后以此为基点，向着已被研究过，但并不系统和那些尚未被研究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它部分继续扩展，从而实现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必然升华物的探寻过程。在这里，马克思以前一直围绕着古典经济学的两个主要问题（价值规律同资本和劳动的交换的矛盾；价值规律同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矛盾），^①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化两个阶段的重要问题。在解决第一个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商品背后的劳动的不同性质，从而确立了科学的经济理论的起点；在解决第二个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又把本质与现象联系起来，达到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的把握。

作为使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科学的假说变为由实践证明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24 卷第 24—25 页。

真理的成熟形态的《资本论》，其中渗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但是，由于受到研究对象的限制，又使这种作为理论底色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带有自己的特点。马克思当时是把历史唯物论作为方法，来解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揭示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规律的，并没有想在那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方面进行彻底的研究和阐述，更没有想到要在《资本论》中创立一个历史唯物论的完整体系。因此，从我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意义上来阐述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他更注重的是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规律，以及由这种运动所产生并决定的各种升华物的变化，更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和解剖，而且这种解剖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结束，马克思本人为自己规定的研究任务也远远未能完成。因此，他更多地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和把握事物复杂关系的方法，而不是许多具体而细致的结论。所以，如果说在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方面能给我们许多直接启示的话，那么想在这部著作中寻找各种现成答案的作法，只是一种空想。但是就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里已大大地深化和细致化了。由于马克思是截取了人类社会发处长河中的一个片断作为典型来加以解剖，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一般的普遍性理论，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是如何产生、形成、并成为一个整体的，这个整体内部又是怎样由于其内在矛盾的运动而呈现出一种带有规律性的联系，它由适应到不适应的过程。从这种特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又怎样地产生了各种升华物，并构成了它们同生产方式的矛盾的。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片断中，都这样活生生地

和盘托出了。这样 我的研究就将证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经济学化的一系列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不仅为我们深刻理解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而且为我们不断把这种一般理论具体化，运用于对各种具体社会运动形态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范例。

犹如任何理论的应用急功近利必然会出现弊病一样，在《资本论》中，基本理论同其在现象上得出的结论之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种情况在马克思当时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存在着，而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就日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这就是马克思把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表现，看作是一种线性的发展过程。这一点在他所得出的个别具体结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我的研究将证明，从本质上升到现象，将经过许多中介过程，这些中介所构成的条件，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不断发生种种变化，这就必然会影响到本质性规律的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则将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具有的弹性不断加大的过程。因此，任何规律只是表现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而不是表现为必然同某些中介条件相结合所得出的具体结论。如果考虑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以及由生产方式产生的各种升华物的弹性的加强，那么就可以看出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发展是一种必然性和曲折性的结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越高，将使得生产关系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弹性，它们之间的矛盾发展在当代就更加具有一种不同于过去中介条件的新的规定性。我认为只有这样来看待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才能更为深入地把握住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和这种规律在各种现象上的具体表

现之间的联系，才能够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再思考，找出在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和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运动规律同它们的现象形态之间的必然联系。

我的研究，就是对以上简单介绍的情况的思索的结果。这种研究，不能说是十全十美，但它是长期思索的结果，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历史责任感促使我做这项工作的。在这里我愿和读者一起 迈入《资本论》这座宏伟的大厦 进行探宝活动。

第二章 历史的回顾

在进行共时态的理论考察之前，我们先从历时态的角度，较详细地阐述一下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化的历史过程，以期首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一种历史感，以便和在后面考察的共时态的理论展开一起，构成一种立体式的有机整体。

第一节 探索科学基点的道路

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必然要求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对于马克思来说，寻找这个理论基点，却经历了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因为过去的“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①在这中间，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现实经济关系的解剖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为主体的哲学和经济学理论的交融过程。正是在这种过程中，理论被深化了，科学的基点被提到了首位。这种在实际的批判活动中逐步确立的那距离现实的批判活动较远的抽象的理论基点，在马克思实际的探寻过程中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77页。

一、从否定劳动价值论转变到肯定劳动价值论，以此为基础阐明资本同劳动的不平等交换的根源(1844—1847)

经济科学的研究，对于马克思创立新的社会历史理论有着重大的作用，同样，这种崭新的社会历史理论一经形成，又成为马克思突破古典经济学羁绊的有力武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可以追溯到 1843 年以前。当时，作为把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寄托于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一开始进入实际的社会生活，就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在发现理论和现实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的巨大分离和矛盾之后，马克思开始了对自己原有的理论信仰进行反思和清算。1843 年底，他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嗣后，由于受到恩格斯天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的启发，马克思明确地意识到解剖市民社会的钥匙必须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①因此，1843 年底马克思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他广泛阅读了当时收集到的斯密、李嘉图、萨伊、奥兰德尔、斯卡尔培克、李斯特、詹姆斯·穆勒、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麦克库洛赫、布阿吉尔贝尔、毕莱、罗德戴尔、色诺芬等人的著作，同时做了大量的摘录和发挥。^②这次批判研究的成果，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初次的系统总结。在那里，马克思一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进行分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31—35 页。

^②这部分著作摘录和批注统称《巴黎笔记》共有 9 个笔记本。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国际版第一部分第 3 卷。

配等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而对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结构及其对抗性矛盾关系进行了深入地批判研究，以说明私有制的历史过渡性和暂时性。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评大纲》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及抽象人性论的严重影响，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最大成果劳动价值论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一点在《巴黎笔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他同恩格斯一样，把价值看作是生产费用与效用的关系，^①用供求的竞争关系来解释价值规定，从而把商品的价格不断脱离价值，不断围绕价值波动，当成了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在对待私有制问题上，马克思还是从抽象人性论出发，把私有制的消亡看作是人的异化状态的扬弃和向真正人的复归。由于客观经济事实和工业实践的伟大力量同诉诸理想人格之间的巨大冲突，使得马克思在他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哲学研究中，越来越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注意到了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从而也在逐渐改变自己以前对待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态度和抛弃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神圣家族》和《布鲁塞尔笔记》^②等著作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对于工业革命的历史和法国大革命史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在许多具体观点上接近或达到了历史唯物论的水平，虽然在看待历史发展动力的一般性问题上还没有完全跳出抽象人性论的窠臼。在那里，马克思指出：“生产某个物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1 卷第 605 页。

^②《布鲁塞尔笔记》是马克思 1845 - 1847 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保存下来的共有 3 卷，其中部分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42 卷。

能卖多少钱 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 ”^①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针对这句话说：“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论了。”^②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已开始注意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例如在批判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摘要中，马克思就明确地认识到李斯特所谓坚持‘生产力理论’同‘斯密—萨伊学派’所阐发的‘交换价值’理论对立的观点，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以交换价值为生产目的，主张德国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主要目的的观点，不过是一种在形式上割裂生产力和交换价值关系的作法，其实质都是一样，即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③这种从以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的对立为基础，通过抽象的人性论武器而达到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转向以经济学中体现的生产力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为基础，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目的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在新的历史理论创立过程中经济学的哲学化。

1846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下半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了创立新的社会历史理论的伟大任务。自此，对历史的说明再也用不着种种臆想和猜测，而可以象对自然界那样，被看成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被这种新的历史理论当作出发点的，已不是任意想出的什么教条，而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61页。

《列宁全集》第3版第55卷第1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254页

物质生活条件。”^①这种崭新的历史理论的前提和出发点包括了三个方面，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由新的需要引起的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家庭）；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三重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关系。只是在这三重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②因此，“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③正是这三个层次的矛盾统一关系，构成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它们矛盾运动的发展和解决，则体现为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的更叠和前进。

新的世界观的创立，给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天地，使他有可能根据已得到的科学世界观对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和现实进行一番新的思索和探寻，从而促使他的经济学观点产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所写的《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两部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仅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称为“抽象的”、“不实际的”，而且还高度赞扬了它，认为“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④这种变化对于已具有崭新世界观的马克思来说是很自然的。既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既然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既然劳动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那么，用这些观点来研究经济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页。

同上第78—83页。

同上第8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92—93页。

题的必然逻辑结论就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

这一时期 虽然马克思还没有系统的经济学观点 而主要接受了李嘉图的经济学思想的影响 但是不能不看到 这时的马克思已经明确地区别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他指出：“货币不是东西 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也象任何其他经济关系如分工一样 是一种生产关系”。^① 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②这种思想已大大超过了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并使得马克思在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中逐渐发现了劳动二重性的理论。

我认为，这一时期马克思突破李嘉图理论局限的最大成果 是体现于《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对于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资本和劳动不平等交换的根源的揭示。它预示着劳动二重性理论诞生的萌芽。

选择对雇佣劳动这种特殊商品进行分析作为克服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的突破口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更深刻的含义。首先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劳动价值论则是这一原理在经济学方面的反映。劳动创造价值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正是雇佣工人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和资本。因此 分析雇佣工人这种特殊商品对于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无疑有着首要和决定的意义。其次 李嘉图批判了斯密把价值由耗费劳动决定和由购得劳动决定混为一谈的错误 但是他自己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4 卷 第 119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 第 161 页。

没有看到价值规律同资本和劳动相交换之间的矛盾。这正是导致李嘉图学派最后破产的两个主要原因之一。^①对于这个问题 马克思不仅注意到了 而且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 还用李嘉图批判斯密的观点批判了蒲鲁东的同样错误。^②因此, 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对说明资本同劳动的不平等交换的根源有直接意义, 而且还有着许多较为直接的思想资料来源。再次, 马克思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关注人类解放始终是他的责任。人类解放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 就是雇佣工人的解放。因此 关心现实 注重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命运 理所当然地是马克思首先要加以考虑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 则有赖于说明雇佣工人之所以处境悲惨的原因, 从而揭示工人受剥削的秘密。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原理, 要求对资本与劳动相交换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进行完全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既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由此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关系, 并且由此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既然工人阶级是生产力中最强大的因素; ^③ 既然在现象上都可看出雇佣工人的贫困正是由于资本家阶级剥削的结果, 那么只有联系资产阶级, 重新对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这一根本问题进行全新的探讨, 才能寻找出其受剥削的秘密所在。在马克思之前, 古典经济学已经阐述了商品二因素的理论, 而且, 李嘉图在批判斯密二重价值论的时候, 正确地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版第 24 卷第 24—25 页。

同上第 97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版第 1 卷第 194 页。

了商品的价值由耗费劳动决定和由购得劳动决定是两个完全不相等的量。这些论述，对于马克思来说，无疑是在全新基础上深入研究雇佣劳动这种特殊商品的出发点。既然雇佣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①那么它本身也必然具有一般商品具有的两种因素的规定；既然商品的价值由耗费劳动决定和由购得劳动决定是两个不相等的量，那么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同他们所领到的工资之间也必然是不相等的。但是，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被形而上学地割裂的。他们除了知道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种规定性以外，就再也知道使用价值对于自己的经济理论还有什么其他用处了。由于研究如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迅速增殖资本始终是古典经济学注意的中心，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发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从而就更无从谈起去揭示隐藏在雇佣劳动这种特殊商品背后的这两个因素的特殊运动规律了。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所揭示的商品价值由耗费劳动决定和由购得劳动决定是两个不等的量及其在雇佣劳动这一特殊商品身上表现的内在机制，正是要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运动中加以揭示，这种运动正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普遍的表现形式。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发现了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他作为工资所领到的价值的不等，来源于在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它的交换价值的不等。由于劳动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无论原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4 卷，第 100—101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 第 335—336 页 第 342 页。

人的劳动、奴隶的劳动、农奴的劳动或雇佣工人的劳动都创造使用价值。它是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这种不等只能来自雇佣劳动这种特殊商品的交换价值，来自特殊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的形式规定。正是建立在这种逻辑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在 1847 年底所作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中对雇佣劳动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了区分，从而揭示了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秘密。虽然在用语中马克思还未明确区别劳动和劳动力，把工人出卖劳动力还称为出卖劳动，从而表现出新事物出现时所必然带有的旧理论形式上的痕迹，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在这个一直困惑着古典经济学的疑难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个理论成果的获得，是同他刚刚创立的新的社会历史理论紧密相联系的。

在如何评价《雇佣劳动与资本》的问题上，理论界存在着分歧。有人认为，这部著作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资本和劳动不平等交换的根源问题，因此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还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而只是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①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诚然，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总体上来说，还未摆脱李嘉图经济学思想的强烈影响。这无论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都有明显的表现。例如，在价值理论上，马克思还未能区分价值和生产价格，因而同意李嘉图关于价值规定的观点。同时他还接受了李嘉图关于商品的价值是

^① 参见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41—242 页。巴加图利亚、维戈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41—42 页。马雷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200—201 页。

由“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入的较大量劳动”决定的思想，^①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工资的最低额始终是工资市场价格趋向的中心。”^②马克思还接受了李嘉图在地租方面的错误观点，甚至接受了错误的“货币数量论”。^③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一下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和哲学思想，就可以发现，犹如马克思在他早期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中从总体上仍然受到费尔巴哈抽象人性论思想的强烈影响，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突破了这种束缚一样，马克思这时的经济学思想也在这一具体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根据有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实际上已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并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数次使用了“劳动力”概念。他指出：“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④“资本家用 5 银格罗申换来的劳动力带来了 10 银格罗申。”^⑤他认为，工人的生产活动是一种“创造力量”；工人为了交换已经得到的生活资料，正是把这种贵重的再生产力量让给了资本。”^⑥这说明，马克思不仅在实际上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而且在形式上也数次情不自禁地使用了“劳动力”这一科学概念。

第二，马克思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来论述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即工资的。这实际上说明了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资本主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第 60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4 卷 第 94—95、105、107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 第 342—343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4 卷 第 125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 第 346 页。

同上 第 347 页。

⑥同上 第 346—347 页。